

Seth Benardete

B O W a n d t h e L y r i c

[美]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 著

弓弦与竖琴

——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A Platonic Reading of the *Odyssey*

程志敏◎译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弓弦与竖琴

——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美] 伯纳德特 著
程志敏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 (美)伯纳德特著；程志敏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6

(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

ISBN 7-5080-3091-5

I . 弓… II . ①伯… ②程… III . 史诗－文学研究－古希腊

IV . 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5325 号

Copyright © 1997 b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3-3427

责任编辑：陈希米

封面设计：闫志杰

版式设计：王玉洁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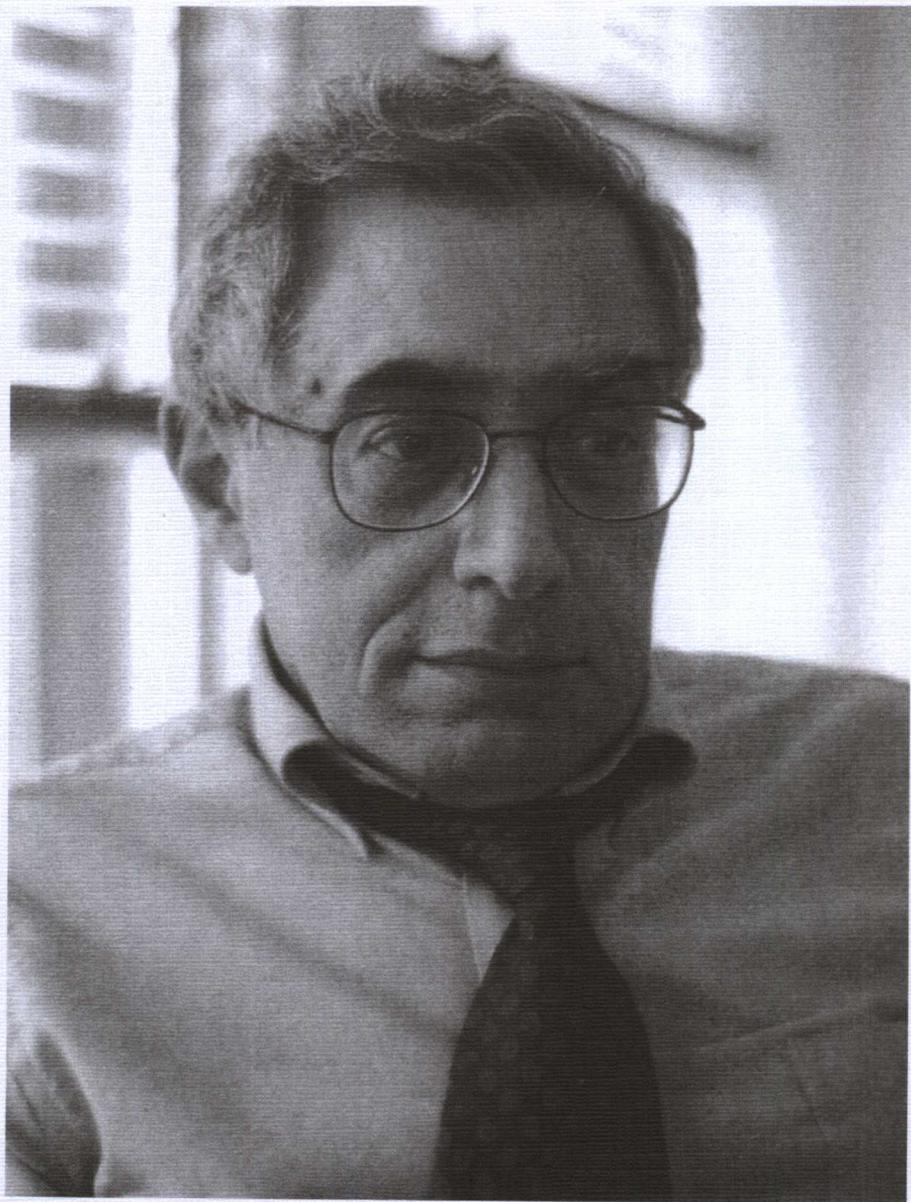
开 本：670×970 1/16 开

印 张：14

字 数：260 千字

定 价：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美]伯纳德特(Seth Benardete)

RAX 75/9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翻译事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逐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逐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赓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

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设计这套“西方思想家：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柏拉图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并非历史的、而是诗化的苏格拉底形象，与这位诗化形象几乎有点形影不离的，还有另一伟人——荷马，其形象倒可能是历史的。说柏拉图的作品围绕苏格拉底这个人的言行打转，也许还不太确切；种种迹象表明，柏拉图的作品也围绕着荷马的精神遗产打转。要是像我国经学的做法那样，将柏拉图作品中明里暗里引到和提到荷马的地方辑出来，一定相当可观。

为什么柏拉图在塑造苏格拉底这一诗化形象时，总让他与荷马这一历史形象形影相随？

柏拉图生活在孔子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谓“礼乐”是什么，我们都晓得；柏拉图时代已经既崩又坏的“礼乐”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荷马史诗所代表的精神秩序。从希腊化时期到当今，凡习古典学问的都晓得，柏拉图对荷马念念于兹，以至于两者的关系始终是个谜——思想之谜。尼采早年用功最深的，就是荷马和柏拉图——在巴塞尔教书的十年中，几乎每隔一学期就开一次关于柏拉图的课，计划写作的《古希腊国家》一书中，第一章就是“荷马的竞争”；若将其早年未刊文稿中的《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和《苏格拉底与悲剧》两篇长文对起来看，荷马与柏拉图有如一张琴弓的两端，尼采似乎把自己变成了由这两端绷紧的琴弦，由此才得以在西方精神这部大竖琴上拉奏出一曲曲醉歌。

对于古典语文学来说，不仅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始终是个思想之谜，与荷马的关系同样如此。

伯纳德特得天独厚，一进入古典语文学，就选择了同时研究柏拉图和荷马——硕士论文写的是柏拉图作品，博士论文写的是荷马作品，从而有可能接近这一思想之谜。完成博士论文后，至少从发表的

论著来看，伯纳德特有好几十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柏拉图身上，似乎没有再碰荷马；通过晚年出版的这部《弓弦与竖琴》人们才知道，其实伯纳德特一直在对荷马作品用功，并没有用博士论文告别荷马。

伯纳德特一生解经几十年，先逐一经解柏拉图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礼法》除外）和其他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史书、悲剧作品，然后再来经解荷马，然后又回到柏拉图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作品《礼法》；如此辉煌的经解成就令人赞叹不用说了，其经解路线似乎也经过精心设计，有条不紊。倘若如此，就值得想一下，为什么伯纳德特要按如此顺序来解经？

荷马作品和柏拉图作品都过于博大精深，如果要搞清楚柏拉图与荷马的思想关系，非得先分别吃透两者不可。这样来解释伯纳德特的经解顺序，合情合理，却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仍然在于，无论要吃透荷马史诗还是柏拉图对话，都不容易。柏拉图在荷马之后，要吃透柏拉图的作品已经难乎其难，遑论荷马。

伯纳德特疏解柏拉图对话的作品很多，其疏解《理想国》的专著有这样一个书名：《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远航》。业内人士都清楚，“第二次远航”本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斐多》中讲述自己的思想经历时的自况说法。当时，苏格拉底与两个爱好自然哲学的青年的一场论辩刚刚结束，师生双方都对讨论不满意。这时，苏格拉底现身说法，讲起自己的思想经历来。他的自述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爱好哲思的人当然得要走出洞穴，但走出洞穴后若老盯住太阳看，会把眼睛看瞎；“第二次远航”是苏格拉底用来说明自己离弃自然哲学、重新转向洞穴——转向政治－道德哲学的比喻。苏格拉底的这一转向，对于西方思想史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柏拉图作品的出发点，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转向——把苏格拉底的转向经历的自述安排在其临终场合，很可能也别有用意。

柏拉图让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用“第二次远航”来比喻转向——这比喻的源头就是荷马笔下的英雄奥德修斯。柏拉图作品结构精巧、用心深远，仅从下面这一点便可略见一斑：《斐多》的中间部分是大段的哲学思辨，开头和结尾却大谈神话（诗）——在开头，苏格拉底甚至说到自己其实老早就在作诗了；临终喝毒药前，苏格拉底果然作了一首有关人的灵魂浪游到冥府的诗篇。冥府之旅本是荷马笔下的重大主题，但在苏格拉底的临终诗作中，对大地之旅的诗化描述不动声

色地取代了对冥府之旅的诗化描述——苏格拉底的灵魂漫游之歌称为“大地之歌”更恰当。总之，无论开头、中间还是结尾处，《斐多》这些涉及神话（诗）的地方，似乎无不明里暗里在与荷马较劲。

为什么伯纳德特要把《斐多》中苏格拉底的自况辞挪来作为他疏解《理想国》的书名？《理想国》最为明显地标识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转向——从而，洞穴说的重点与其说在于爱好哲思的人走出洞穴的时刻，不如说在其回到洞穴的时刻，因此，将《理想国》视为柏拉图作品的真正基点不为过。但这恐怕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要用“第二次远航”来题名《理想国》义疏。

要是我们留意《理想国》的结构，也许不难发现：虽然《理想国》篇幅远大于《斐多》，从整体结构来看，两者显得有某种结构上的照应：与《斐多》一样，《理想国》也头尾说诗（卷二、三及卷十），中间是论辩，而且都以苏格拉底作诗结尾，两场对话的地点也都不在雅典（一个像在海南岛、一个像在香港）——当然，中间的论辩讨论的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斐多》论辩的是所谓“纯哲学”，《理想国》论辩的是政治的哲学，尽管如此，在论辩的高潮时分，教育都是中心话题。

当然，《斐多》与《理想国》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在头尾说到诗（神话）的时候，《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对荷马作了明目张胆的攻击（第十卷中的攻击尤其暗含玄机），在《斐多》中，苏格拉底对诗人荷马的态度——用个不好听的说法——要阴司倒阳得多。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荷马这两个主要人物站立得太近，让人觉得柏拉图似乎企图用苏格拉底形象取代荷马的身影，其代价是：柏拉图自己得由哲人化身为诗人——要说“诗化哲学”，柏拉图看来才堪称真正的鼻祖。如此取代恐怕还不仅仅因为时代已经“礼崩乐坏”，更有人民信赖的礼法与哲人凭靠的智慧之间剪不断的不和关系。毕竟，苏格拉底在雅典受到的指控是“渎神罪”，这个所谓被“渎”之神，不能说与荷马的诗化“神学”一点关系没有——《弓弦与竖琴》在“开端”部分就点出某种“神义论”，绝非偶然。由此看来，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紧张，并非西方近、现代才有的事情。

伯纳德特为自己的这部疏解《奥德赛》的论著加了副题，如果直硬地翻译就是：“《奥德赛》的柏拉图式解读”；如果悉心体味，意思似当译作“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于是就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要通过柏拉图——而非现代的种种什么“理论”——来解读荷马？

这问题让笔者想起廖平在批评宋学时说到的事情——其大意是：要进入古代大圣贤的作品，需要借助在时代和心性上贴近古代大圣贤的理解；宋儒离传解经，无异于抹去了通向古代圣典的思想心迹。现代学科发明的各种理论声称可以搞清楚古代经典的蛛丝马迹——这可能是真的；但有一点肯定不是真的：无论把玩文物式的还是后现代式的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可以让我们懂了古圣贤的笔下心迹。廖平主张回到前汉经传，以便领会孔子所作之经；伯纳德特通过柏拉图进入荷马，看起来就像把柏拉图作品当作了荷马史诗的传——类比总不会完全恰切，但如此经传类比用来表达这样的意思还是有可能的：通过柏拉图才能更好——更为贴近圣人心迹地理解荷马，反过来，通过荷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柏拉图。解过《奥德赛》之后，伯纳德特才来疏解柏拉图的《礼法》，看来也是大有道理的安排。

为什么伯纳德特要给这部解读《奥德赛》的书题名为《弓弦与竖琴》，笔者不敢贸然乱解，仅打算提到一则文献供读者思考。柏拉图《会饮》中那位代行“酒令”的医生厄克西马库斯在礼赞了医祖——荷马笔下的医师 Asclepius（《伊利亚特》卷四 219、449 行）后，又说到音乐同样受爱欲引导；作为印证，他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

Tόν γάρ φησι διαφέρομενον αὐτὸν αὐτῷ ξυμφέρεσθαι ὥσπερ ἀρμονίαν τὸ
ξου τοῦ καὶ λύρας.

一分为二，然后又自己与自己合在一起，有如弓弦与竖琴的和谐音（柏拉图，《会饮》，187a）。

要解释这弓（弦靠两端分离的紧张才能拉琴）的比喻，已经是个大题目。在《善恶的彼岸》序言中，尼采用弓来比喻欧洲精神的紧张状态，但弓不是用来拉琴，而是用来射箭——射猎一个精神上的大目标，还说这张本来绷紧的弓已经被现代民主政治搞松弛了。懂得荷马的尼采没有回到荷马，但通过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的对立，重新提出了诗人与哲人的关系问题；伯纳德特通过回到荷马来重新摆正这一问题，肯定不仅仅是出于古典文学的专业兴趣。

伯纳德特学术出身于古典语文学专业，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

员会师从古希腊文学大师 David Grene，却被在政治系教书的施特劳斯吸引，转而同时受业于其门下。在施特劳斯的弟子中，伯纳德特的古典语文学功夫可能得算最好，懂得因材施教的施特劳斯大概同他谈过一些没有与其他学生谈到的事情（仅施特劳斯写给伯纳德特的信现存的就有 170 封）。这是伯纳德特的福分，但他没有据为私有，而是化作具体的学问传给我们（参见“前言”）。

施特劳斯花费了好几十年时间来穿透近现代哲学的传统偏见，第一部疏解古希腊政治哲学经典的著述（《论僭政》）出版时（1948），施特劳斯已经快到不惑之年；此后，他还花费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来消解近现代哲学的传统偏见。等到这一历史性工作基本完成转而倾注心力于经解时，施特劳斯的健康已经越来越差。临逝前不久，施特劳斯曾对布鲁姆说过，要是健康允许，他还有许多事情想做。从施特劳斯晚年所做的来看，也许可以推知，他想做的无非是悉心疏解古典哲学的经典作品。

伯纳德特有幸还不到耳顺之年就遇到施特劳斯，又有大概相当于尼采的古典语文学功夫，本可成为不晓得哪类人们所谓“原创性”的“大家”，然其一生学术似乎仅仅是做施特劳斯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当然不能说，伯纳德特的经解可以代替施特劳斯的经解。毋宁说，凭其学识，如果要写什么可广泛用作大学教材的“古希腊思想史”、“荷马概论”或“古希腊文化通论”，对于伯纳德特肯定都不过举手之劳，但他没有在这方面花时间，而是尽其天分和勤奋径直走在施特劳斯开辟的“今文”经学之路上。伯纳德特很清楚，老师不是偶像，而是榜样，重要的是循老师提示的路径进入古学经典，与古代先贤一起“会饮”，对后现代的事情置若罔闻。

有一件事情长期让笔者感到一筹莫展：如果心仪古典作品的话，该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处境与这些作品建立起活生生的联系？现代史学的搞法即便很小心，也容易把古典作品变成历史标本，现代的各种文化研究或文化哲学要么在这标本上用手术刀乱划一气，要么让这标本穿上后现代服装——《易经》穿系统论服、孟子穿人民民主论服、庄子穿存在主义服——满世界跑（笔者就见过有西洋学人让欧里庇得斯穿存在主义服满世界跑）。要是鄙人天生就讨厌这一切，该怎么办？施特劳斯把古代的伟大圣贤（绝非仅仅柏拉图，还有色诺芬、修昔底得、阿里斯托芬）活生生地领回到当今生活世界，让我们看

到，原来他们就在我们的“会饮”中，只不过我们一直不让他们说话而已。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奥德赛》就有了杨宪益先生的散文体译本，前些年又有了王焕生先生的诗体译本；可是，面对翻译过来的原典，我们仍然无从读起：为什么还要读荷马？如何读？如果不是学古希腊文学专业的，多半读不下去，买来《奥德赛》摆在书橱，算有了一部经典而已。伯纳德特的《奥德赛》疏解没有用自己的专业来让我们头痛和乏味，甚至没有把读《奥德赛》变成西方古典文学专业的事情，而是让我们带着自己的精神困惑进入奥德修斯的精神之旅，到头来我们非亲自悉心阅读《奥德赛》不可。

笔者深感遗憾，伯纳德特未能见到此书中译本面世；半年多前，这位笃行纯学的“学者兼思想家”（曼斯斐尔德语）在其疏解柏拉图《礼法》的专著出版后突然谢世，让笔者惘然若有所失。追悼会据说很小但隆重，纪念文都朴实无华，这里选了两篇（一篇出自其学生、一篇出自其友人）作为附录，以便有心的读者了解伯纳德特的学术行迹。

刘小枫
2002年7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关于文献的说明

本书所引《奥德赛》出自 Peter von der Mühll 的托伊布纳 (Teubner) 第 3 版 (1984 年)。我大量采用了该版的措辞和标点，但并未相应采用其标示文字和插入文字。

在译文中，我删掉了一些对我的阐释无关紧要的辞藻或用语；亦略去凡我认为是插入性的段落，且不加说明。

书中大量引语都是关于《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奥德赛》的卷号，罗马数字代表《伊利亚特》的卷号。

【译按】中译主要依据王焕生译本：《奥德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参照杨宪益译本：《奥德修纪》，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必要时综合这两个译本，不再一一注明；《伊利亚特》则据罗念生、王焕生译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前　　言

40多年前，我首次研读荷马时，为了理解《伊利亚特》(*Iliad*)的情节，我用上了从柏拉图那里找到的方法。后来，当我研读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时，柏拉图用以揭示那些组成城邦结构的前政治(prepolitical)和政治性要素的方法，对我来说好似阐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七雄攻忒拜》(*Seven against Thebes*)、《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和《安提戈涅》(*Antigone*)的指南。在所有这些解读中，柏拉图就好像能帮助我找到古代著作家的微弱踪迹的地图或坐标，因为这些著作家本身毫无瑕疵，故而不能像柏拉图那样引导我。于我而言，柏拉图似已赐给我那些只有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本人才会表明的观点。可以说，逻各斯(Logos)打开了范式理解之路。虽然我隐约地意识到，如果柏拉图老是在我头脑中，范式理解就可能会是被迫的和任意的，但那于我也绝不会太过有扰，绝不会甚于一个在黑暗森林里东奔西突的旅人，在碰到一片林中空地并重新燃起希望时对自己命运的怀疑。所以，对我来说，柏拉图手中也并没有那种能够解释这场行进在地图与实地之间不寻常之旅的史册。我从不认为柏拉图从诗人那里学到过什么，对我来说，这也绝不是一种要回过头去颠覆哲学受惠于诗歌的阴谋。我现在仍然对两者的对立十分着迷，这两者的对立是柏拉图在让苏格拉底(Socrates)谈到“诗歌和哲学的古老论争”中建立起来的。

在哲人拒绝承认诗人的“智者”头衔之前，诗人原本就是智者。即便哲人抗议，诗人仍自封为智者。诗人的智慧是庸俗的智慧，只是拿来把三万或更多人弄得头昏脑胀而已，却没有能力经得起个人的盘诘(参《会饮》，175e2–6)。然而，如果诗人身上保有柏拉图清楚阐述过的那种预期品质，人们似乎就还得退而认为诗人说出了许多美丽的事物，只是这些诗人不知道它们的意义罢了(参《申辩》，22c2–3)。偶然中的可以是本乎自然的，但一模一样的成功就让人怀疑是做了手脚。如果做了手脚的话，要把诗歌从哲学中简单分离出去，就不再可能了。从原则上说，这种分割的模糊性可以让非理性闯入理性领

域，而不是让理性扩张至那些从前看似非理性的领域。但我看不出要怀疑哲学思想的理由，相反，我倒认为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重新划定诗歌与哲学之间、或者更重要地重新划定某些诗人与柏拉图之间的界限。这种方法涵盖了苏格拉底所谓的“第二次远航”（second sailing），苏格拉底用这个术语来指称其思想上的转变，即，放弃自然哲学（cosmology）的直接方法，转向语言（而非存在物）。我认为正是在这场转变中，诗人超越了苏格拉底。因为我心中总有一个疑惑，说假话有如说真话——这正是所有希腊诗歌所仰赖的——原则，如何可能比讲真话本身更好，因为，这对我和对苏格拉底来说都十分显而易见：人们不可能故意撒谎，除非他知晓真相。

缪斯（Muse）告诉赫西俄德（Hesiod）说，她们说假话有如说真话，还说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她们也说说真话。如果缪斯不彻底甄别真话假话，她们所唱的歌里就既有假话也有真话。在《奥德赛》第十九卷中，奥德修斯（Odysseus）在佩涅洛佩（【译按】Penelope，奥德修斯的妻子）面前打扮成了克里特人。他讲了个故事，说奥德修斯在前往特洛亚的路上曾和他在一起。如果此奥德修斯不是彼奥德修斯的话，这个故事也会是完全真实的。假设伊多墨纽斯^{*}有一个弟弟，没有去特洛亚，而伊多墨纽斯又在奥德修斯到达十至十一天前就已去特洛亚，奥德修斯就可能在克里特待十二天，并受到奥德修斯自称的那些克里特人的欢迎（19.171–202）。紧接着奥德修斯所编的故事，荷马说那是假的，但像真的一样——荷马写道，佩涅洛佩边听边流泪，她的表层在融化，“有如高山之巅的积雪开始消融，由泽费罗斯堆积，欧罗斯把它融化，融雪汇成的水流注满条条河流；佩涅洛佩泪水流，沾湿了美丽的面颊”（19.203–8）。**荷马把自己的假话与奥德修斯的假话相提并论。荷马的假话在言辞中，奥德修斯的假话在叙述者（荷马）那里。荷马的假话是一种意象，荷马在比喻中宣称那种意象是虚假的意象。该比喻为“融化”一词的字面意思提供了语境，这个动词引申来形容佩涅洛佩的眼泪。这样描述眼泪，就好像眼泪是从脸上消

* Idomeneus，克里特首领，米诺斯的孙子。奥德修斯在其妻面前即谎称自己是伊多墨纽斯的弟弟。——译注

** 原诗中并无“表层在融化”字样，可能系英译与汉译之不同。泽费罗斯是西风，十分寒冷，常带来暴雪。欧罗斯是东风，强烈而温暖。原文即直译为“西风”、“东风”。——译注

融和溢出的，在佩涅洛佩的身上，除了水之外，我们什么也感觉不到了。荷马的意象使真话和假话并行不悖。如此一来，假话似乎就多余了，这些话就得换个方式来说，还要把假话以及支撑假话的证据一并删掉。然而，仍无法确定的是，换个方式所说的真话，是否就比假话所包含的虚假更为真实。佩涅洛佩不会融化掉，但如果不能融化掉，佩涅洛佩在奥德修斯面前就不能表达她心中对他的怜爱，这也是因为奥德修斯的眼睛停滞不动，“有如牛角雕成或铁铸”（19.209–12；另参262–4）。谎言互相发明，它们加在一块就能说明白那些真话说不明白的东西。荷马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可能性，他自己那种表明一种永远不可能的不可能性，奥德修斯的那种是有条件的不可能，并因叙述者的不同还会成为一种可能性。

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粗略地概而言之，诗人把从未发生过的和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混为一谈了。但深入探究这个例子就会发现，有条件的不可能性实则包含了绝对的不可能性，既然他假定奥德修斯既是他自己又是别的某个人，就与绝对的不可能性毫无二致，因为他还假定积雪和面颊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回事。那么，诗人就把必然为一的分割开来，又把必然为二的融合起来。荷马运用了他自己的辩证法，即在两种虚假的形式中凸现真话。这两种形式并非诗人独家专有。随便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扮演别的什么人——我们直接引述他人的话时就是在扮演他人，那么我们就在（把自己）一分为二，我们如果间接转述——我们常常这样说话，我们就在合二为一^①。然而，诗人却是系统化地如此叙述。我们把这种系统叫做诗歌辩证法的谋划。这种谋划是要将诸种明显或不明显的不可能性予以公开。它通过言语和行为揭示那些内部寓二于一或寓一于二的事物。在这个公式中，“二”可以代表任何数字。俄狄浦斯说：“一能等于多，此乃不可能”（《俄狄浦斯王》，845）。索福克勒斯表明这种算术法如何不可能。这显然是俄狄浦斯所猜中之谜的翻版，即四、三、二都为一。俄狄浦斯之名表明两样东西：智慧和残废。它们显然是偶然聚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把已长大成人的俄狄浦斯和刚出世的俄狄浦斯区别开来。但那种谋划却将他们绑在了一起，并让俄狄浦斯猜中了他本人就是答案的谜。奥德修斯有两个名字，一个是他自己起的，另一个是他外祖父起

^① 另参 50151–52，奥德修斯泪流不断，消磨着美好的生命。

的。这两个名字都意味深长，但它们却显然意味着全然不同的东西。《奥德赛》的谋划与它们有联系。

诗歌辩证法的最高境界就是诸神^①。当阿基琉斯要杀害阿伽门农时，雅典娜按住了阿基琉斯的头发，可以说荷马就已经把一变成二了，并且阿基琉斯的“第二种想法”^{**}就被分隔成独立无依的存在了，但荷马在别的地方把“第二种想法”和神作了区分。按照柏拉图的思想，至少在某一处（即苏格拉底在《斐德罗》中第二次开言时）如此，上升到存在物之路，通常以不同的方式由虚构奥林波斯诸神来实现。这些神就是说谎有如说真话的代表。他们似乎把仿冒与造像结合了起来。它们既是一的虚假对立面，又是二的虚假的一：一般说来，厄洛斯（Eros，爱神）既被理解为施爱者，又被理解为被爱者。我们尚不清楚在我们开始研究《奥德赛》之前，这些诗人们是否已经在这方面先柏拉图而发制人，或者说他们曾向柏拉图指明这种理解他们行为的方式，他们也就是自行终止了这种先发制人的行为。如果他们终止了，我们就会懂得，柏拉图为什么肯定是诗人的导师，此外，关于诗歌与哲学的古老论争还会保持下去。然而，如果它们没有自行终止，柏拉图就恢复了一种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并非是通向哲学的道路，而本身就是哲学，再说，作为诗人的柏拉图与作为哲人的柏拉图之间的表面张力就消失了。吾师施特劳斯晚年常常向我说起这种可能性，但那时我还不能真正懂得他的想法，而且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此时所懂得的，是否就是他真正的想法。不管怎样，本书就是为探究他所指明的那种可能性而写的。

我为西门子基金（the 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 Stiftung）提供1994年春夏季访问席位以完成此书而深致谢忱。对于该基金会的

① 贺拉斯（Horace）在谈到诗歌的来源时，引用了一行半恩尼乌斯的话，贺拉斯在这句话中说明了诸神的构成就已经把诗人和打油诗人（versifier）区分开来了（《讲道集》〔*Sermones*〕，1.4.38–62，另参89）。在贺拉斯自己的抒情诗中，诸神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反倒与《颂诗》中的〈自然颂〉（1.28.15）这惟一的例子有关，而在其余颂诗中共34处，比较而言在他的韵文中就很少出现诸神的名字了。【译按】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169），古罗马诗人、戏剧家，一生致力于向罗马人介绍希腊文学和哲学，作品包括戏剧、史诗和哲学等，主要诗作为《编年纪》，全书18卷，现仅存残篇。

** 事见《伊利亚特》第一卷。愤怒而痛苦的阿基琉斯当时有两种想法，要么杀死阿伽门农（Agamemon），解散大会；要么压住怒火，息事宁人。此处的“第二种想法”即指“压住怒火，控制自己的勇气”（1.192）。——译注